

中国国际安全观话语的构建与传播

孙吉胜 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

话语是国际安全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话语不仅呈现安全问题,同时也塑造安全感知,甚至导致安全危机。安全话语与安全政策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国际安全领域的话语竞争、话语碰撞和话语博弈随处可见。对于同一个安全问题,不同表述或解释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认知。国际安全领域实际也需要话语“治理”,以更好地消除分歧,塑造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安全问题日益重视,在国际安全领域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需在国际社会具有超出一般国家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塑造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际社会对自己提出的理念和主张的认可、接受,甚至欢迎和效仿。如何来构建和传播中国的安全观,如何使其被国际社会理解接受是当前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话语与国际安全治理

国际安全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而话语是国际安全治理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要素。

首先,话语可建构安全感知,影响对安全问题紧迫感、威胁程度等的认知。话语描述和表达关于安全的信息,同时也可把原本不是安全问题的问题建构成安全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学派就提出了安全化理论,安全被认为是主体间通过言语行为塑造而来。不仅如此,针对同一安全问题,不同话语会直接影响安全化程度的高低。例如,关于气候变化这一客观现象,克林顿执政期间它被表述为一个紧迫的安全问题,而小布什执政期间则被去安全化,两种导向直接导致了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

其次,国家间围绕安全问题,存在大量话语博弈,话语冲突和话语竞争无处不在,对立话语经常会强化威胁感知,恶化安全局势,甚至导致危机。例如,2016年美国关于南海的话语紧紧围绕“中国破坏航海自由”,借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使南海问题在国际层面

危机化,中国被贴上了威胁地区稳定、破坏航海自由的标签。中国也针对该问题与美国进行了大量的话语博弈,指出南海航行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而是美国插手南海问题的借口,只能破坏该地区稳定,损害中国与东盟国家利益。此类话语互动使南海成为2016年世界聚焦的一个安全问题。

最后,身份和安全政策通过话语这一媒介保持平衡,安全话语直接影响身份建构和国家安全政策。同时,安全政策也需通过话语来呈现。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当前世界面临很多新问题需要去描述,去阐释:如何解释欧洲难民危机的原因、如何解释“伊斯兰国”的突起、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对未来安全的影响等,不同解释会直接影响安全政策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讲,国际安全治理也存在安全话语治理,治理得好就可营造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话语秩序和软环境。

二、中国安全观话语的演进与独特性

安全观是一国对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主观认识,如对安全威胁的来源、内涵、条件、维护手段等的判断。中国在不同阶段根据所面对的国内国际安全形势和自身实力做出判断,并形成相应安全观。中国安全观在不同时期关注点不同,但一直有别于西方安全观,具有话语独特性和独特内涵。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到2013年,中国一直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中国政府在1996年正式提出“新安全观”主张,并在后来文件中不断补充。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瑞士发表题为《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中国的新安全观。他指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

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互利、平等、协作”首次被确定为“新安全观”的核心。《2008年中国的国防》政府白皮书强调,“面对共同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把中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2013年4月发布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政府白皮书指出:中国倡导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更是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对原有安全观进行了调整,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在2014年5月召开的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正式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该安全观也被写入当年的《上海宣言》。在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他再次强调,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主张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再次强调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可持续安全观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并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此外,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总体安全观同样致力于“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强调各领域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谋求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以实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①

由上可见,中国的安全观和安全话语具有自身独特性,有别于西方安全话语。按照西方理论,提到安全人们首先会想到安全困境、囚徒困境、零和博弈、国强必霸、大国必战,或是权力政治和丛林法则,体现的是二元对抗思维,背后是竞争、冲突逻辑。中国的安全话语则与西方安全话语不同,既体现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也体现中国外交传统和中国安全话语的独特性。

首先,中国的安全观完全否定了西方安全逻辑,从二元对抗思维转为和合思维,直接导出不同的安全治理理念和治理政策。在该逻辑引导下,中国的安全观不再把竞争、敌对放在首位,不再仅强调相对收益,而是强调合

作共赢。

其次,中国的安全观强调共性,而非个性。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非传统安全,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这些安全问题都属于人类共性问题,都不是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单独应对。当前世界秩序的维护涉及的很多问题也是如此。正如杨洁篪在第5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强调的,“我们应当寻求安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既让自己安全,也让别人安全,共同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

最后,中国的安全观强调综合性和关联性。很多安全问题表面上看各自独立,实际上背后可能紧密相连,有时甚至互为因果,传统安全问题经常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例如,如果把欧洲难民危机单纯视为社会安全问题,可能就很难从本质上解决,它实际与美欧在中东的政策有关,而欧洲不同国家所持的不同立场和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又进一步使欧洲内部分化。中国的安全观恰恰强调综合性和关联性,强调追根溯源,综合施策,协调推进。

正是由于中国安全观的独特性,加之西方话语霸权和学术话语权的影响以及中西语言文化差异,仅从简单的字面翻译很难让这些理念在国际社会有效传播。如何从学理层面、从学者研究层面来传播这些新理念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三、中国安全观话语的构建与传播

中国安全观话语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思维特点和秩序观。中国的秩序观强调“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与霍布斯文化中的丛林法则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理论所描述的丛林法则被道德和礼制所规范的和合秩序所取代。中国的秩序观使中国可以更理性地认识和对待世界差异,“文明的冲突”概念被自然化解。^②也正是因为这种秩序观的影响,中国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未来世界秩序的最终目标,中国的安全观、发展观、治理观等都体现了这一理念。对于传播中国的安全观而言,除了传播安全观本身的具体内容之外,还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安全观背后的理念,需充分阐释中国文化内涵。

首先,中国文化重视整体性,强调群体性思维,从全局而非局部出发来看待事物的性质和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也可从中国外交实践体现出来。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际也是中国整体性思维的一个集中体现。近年来,中国创建和倡导的系列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中

东欧间的“16+1”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澜湄合作机制等都是把原来零散的个体聚合在一起,再在一个整体架构下来解决共同问题,深化务实合作。这种整体性思维也是中国安全观的一个出发点,即从整体性视角来把握、分析和解决全球的安全问题,可更好地体现平等性、普遍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其次,中国文化既强调事物的差异性,又强调关联性。事物之间存在差异性,是一种自然状态,同时又相互关联、相互转化,即人们经常说的“同”与“异”的关系。中国思维强调包容互鉴,非二元排他,两个对立事物尽管对立,但相互依存,可相互补充、相互转化,就如同两极、阴阳,双方各有优势,最终形成一个由差异构成的和谐整体。当今世界,安全问题已从传统的军事、政治向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领域扩散,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变化;彼此间经常出现连带、外溢效应,如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欠发展的贫穷落后国家不仅难以保证自身安全,而且其社会和安全问题很容易波及其他国家。中国强调可持续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突出发展与安全并重,以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实现持久安全。不仅如此,当前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今天是一国的安全问题,明天就可变为另一国的安全问题。信息化的加速,尤其是网络信息在全球的快速传播更加重了外溢和连带效应。面对世界各类复杂、多样、交织的安全问题,当前就更需要综合、互为因果的视角,统筹维护,综合治理。

最后,重“和合”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强调在面对相互对立事物时,要尽力调和二者间的矛盾,努力使之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达成和谐状态。这种思维方式也使中国的安全观如同中国外交的其他领域一样强调合作共赢。实际上即使在冷战结束已近20年的当今世界,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在安全领域仍体现较多,国家间相互博弈观念尤重。但是,当前全球的很多安全赤字没有合作思维根本无法解决,如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疾病传播、移民问题等,而共同安全的实现需要多元化手段,需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来寻求共同安全。这种合作思维可引导各国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意识,之后逐渐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最终通过合作谋和平,通过合作促安全。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传播的具体语言,需加强安全叙事研究。

中国的安全观简明扼要,仅字面翻译很难让外国受

众完全理解其中的内涵。党的十八大后,中国政府日益重视话语影响和话语权,2013年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之年。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9月,中国政府号召要加强中国的宣传能力,改进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这也是从政府层面首次聚焦话语体系。而讲好中国故事应该包含多方面的故事,既包括中国传统、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也包括中国理念与中国理论。但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学者似乎从学理层面进行的扎实研究并不多。我们可以从国外学者的一些相关研究得到一些启示。例如,美国有学者专门研究美国的安全叙事。该研究表明,叙事场景、言辞模式和叙事者的权威性都会影响到叙事效果。当叙事场景比较确定时,一般需要采用辩论式(argumentation)模式,如果不是特别确定时,最好采用故事模式(tell a story)。^③例如,“9·11”之后,布什政府讲述了一个关于恐怖分子的故事,被认为是涉及美国安全最成功的叙事之一。

第三个方面是重视传播受众的研究,需外外有别。

不同受众由于文化与背景知识不同,对同样的话语经常产生不同的理解。“同样的语言,不同的理解”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例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主要强调中美在亚太地区可以共存,互利共赢。美国可能会理解为中国在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的领导权,而有些国家则理解为中美要共同领导亚太地区,共治亚太地区,而把其他国家排除在外。^④理解过程受社会语境、背景知识和实践习惯的影响,也涉及情感和认知基础。不同背景的人对所接触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完全不同,需根据不同国家的受众来设计传播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语言。这也就是人们经常强调的,对外宣传不仅要内外有别,有时还需外外有别。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ZZD029) ㊟

「注释」

- ① 宋伟:《新时代中国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7-10/24/content_41785115.htm, 2017年10月24日。
- ② 孙吉胜:《中国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
- ③ Ronald R. Krebs, *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④ 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3期。

责编:吴奇志